

玉海楼里这块匾额背后藏着一段金石情谊

■李佩 林良莉

从南门进玉海楼时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建筑考究的门台正上方“百晋精庐”四个大字,大家也许会有疑惑,不是玉海楼吗,怎么是百晋精庐? 其实,我们平时所讲的玉海楼,是玉海藏书楼、孙诒让故居、百晋陶斋、颐园、后花园等总称。玉海楼总体布局,南北坐向,为三条纵轴线。百晋精庐,也就是百晋陶斋,坐落在中间线上,玉海藏书楼西侧、故居东侧,前面有“颐园”。它原名“恰受航”,俗名“船厅”,由孙诒让父亲孙衣言取杜甫“野航恰受两三人”诗意命名,后为孙诒让收藏古砖之所,故改名“百晋陶斋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百晋陶斋”隶书匾额是由晚清金石学大家王懿荣题写的。一位是“甲骨文之父”,一位是甲骨文系统研究的第一人,这块匾背后,藏着一段动人的金石情谊。



百晋陶斋

王懿荣题写“百晋陶斋”匾额

王懿荣(1845—1900),字正孺,又字廉生,山东福山(今烟台市)人。他是晚清重臣,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学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三任国子监祭酒(相当于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校长)。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,是最早发现、鉴定并收藏甲骨文,被誉为“甲骨文之父”。

王懿荣是什么时候题写的匾额?匾额上落款为:“中荣尊兄署,光绪九年五月”,也就是1883年题写的。光绪六年(1880),王懿荣中进士,1883年为翰林院编修。这年春,孙诒让在京参加第五次礼部会试,落榜。孙诒让“夏五月,假装南归。”这说明,王懿荣是在京城为孙诒让题写的字,孙诒让可能随身把墨宝带回了瑞安。

孙诒让与王懿荣是什么时候开始结交的?最早记载是同治十年(1871)京城的一次聚会。孙诒让这年第二次赴京会试,落榜。五月一日,潘祖荫、张之洞在京城龙树寺设宴饯别即将离京的部分应试举子,包括胡澍、赵之谦、李慈铭、王懿荣、孙诒让等十九人。潘祖荫、张之洞是孙衣言同僚好友,孙诒让还师从张之洞,自然成为这

次饯别宴中的一员。王懿荣比孙诒让大三岁,这年也参加会试,也未中榜。潘祖荫、张之洞邀请的这些人,虽然未中进士,但他们已是当时金石学研究的名士。24岁的孙诒让与27岁的王懿荣因共同的志趣而结交,这可能是他们结交之始,又或者在这之前两人就已认识、结交。不管在何时认识,12年后,王懿荣应邀为孙诒让题写匾额,便是两人金石情谊的最好见证。

现在,我们看到的“百晋陶斋”,只是王懿荣题写的其中一幅作品,当时王懿荣为孙诒让题写了两幅,还有一幅用篆书书写的“百晋精庐”。落款“光绪九年五月,中容二兄属,懿荣署”。这幅字我们很少见到。

懿荣题写“百晋陶斋”“百晋精庐”两幅字时,还没有玉海楼(1888年才建成)。孙家当时住在建于1875年的“邵畴寓庐”(公园路太平石),后为“治善祠塾”。寓庐北斋三楹为孙诒让回来时学习的地方,他自喻“述旧斋”。孙诒让想不到,13年后,父亲为他建造了玉海楼,自己辛苦搜集的古砖有了好的归宿,而王懿荣的题字为它增了辉。



王懿荣

孙诒让



玉海楼

“百晋陶斋”的由来

关于“百晋陶斋”名字的由来,我们得从孙诒让治学经历说起。

孙诒让出身儒学之家,自小在父亲的影响、指导下,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。他长期跟随在外做官的孙衣言身边,行走全国各地,还常常参加各种文人雅会,接触到众多文字学大家,掌握了音韵、训诂、校勘、考据等治学方法,并接触到大量古籍善本。他13岁就草拟了《广韵姓氏刊误》,开始古籍的校雠,显示出古文字学的天赋。17岁得阮元的《钟鼎款识》,并校诸款识,开启治金文之学。1870年,孙诒让得友人所赠之富贵砖及残砖各一块,正式开启搜集、钻研、破解古砖、古碑、摩崖石刻上文字之旅。特别

从第四次应试落第回到瑞安后,孙诒让与从弟诒燕、同邑好友林庆衍、周琰、周璟兄弟等人踏遍瑞安及永嘉(温州)乡间山野,寻砖、访碑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到1880年,孙诒让已搜得一批古砖、古碑,并记下每块古砖(碑)的出处、年代、文字形制,还予以考证,草撰《瑞安古甃记》。1882年,搜集古砖达100多种,孙诒让拓印了《藏砖拓本》,并寄给同邑好友黄绍箕。

这年,孙诒让已收藏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等代古砖逾百种,他把自己居住的地方,称为“百晋精庐”,别署“百晋陶斋”,以志收集古砖石刻之乐。这就是“百晋陶斋”的由来。

甲骨文之父与甲骨文研究第一人

孙诒让与黄绍箕是同邑挚友,并称“二仲先生”。王懿荣与黄绍箕也是好友,同在京师为官。有了这层关系,孙诒让与王懿荣的关系自然更进一层。1890年,孙诒让以资郎身份滞留京城时,与黄绍箕、王懿荣、潘祖荫、陈介祺、盛昱、费念慈等名家一起讨论金石文字。雅集时,大家拿出所藏金文辨证难字、考证题跋。孙诒让在《古籀余论后叙》中写道:这段时间“考跋累累,装成巨册”。王懿荣与孙诒让交游的其他史料,如信札、诗和酬唱等,目前还未得见。最后是甲骨文又把两个人连在一起。

王懿荣有“甲骨文之父”之称。光绪二十五(1899),王懿荣因患病服药,在其中一味叫“龙骨”的中药上发现奇异符号。凭借其深厚的金石学造诣,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绝非普通刻痕,而是古老的文字,并将其时代断为商代。随后,他派人到北京的药铺大量收购带字龙骨,先后共收集了约1500片甲骨。王懿荣这一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,成为我国第一个发现并鉴定甲骨文的人。

王懿荣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甲骨上的文字,第二年,八国联军进攻北京,他被临危受命为京师团练大臣,负责防守京城。北京沦陷后,王懿荣拒绝逃

亡,毅然选择以身殉国。王懿荣是一位清官,去世后留下债务,其长子王崇烈为还债,卖掉1000多片甲骨,由《老残游记》作者、文字学家、金石学家刘鹗(1857—1809)购得。1903年,刘鹗在收集有字甲骨10800片的基础上,精选1058片拓刻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的基础文献性著作《铁云藏龟》。

1903年11月,孙诒让购得《铁云藏龟》,喜出望外。凭借40多年金石文字研究之深厚功底,他花了两个月仔细研读、破解《铁云藏龟》里的甲骨文字,首次将甲骨文分为十类(如月日、贞卜、卜事等),并考释出185个甲骨文字,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——《契文举例》。这时,距离王懿荣去世已近四年。如果王懿荣还健在的话,孙诒让也许会第一时间把书稿寄给王懿荣,一起分享破解甲骨文的喜悦。

还有一件遗憾的事,孙诒让写成的《契文举例》书稿一直躺在玉海楼书斋里,不为人知晓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书稿写好后,孙诒让让人抄写几份,寄给刘鄂、端方、罗振玉等人。数年后,刘鄂客死新疆,端方也死在军中,而罗振玉当时认为其书“未能洞悉奥隐”,没有引起重视,以致还丢失了书稿。直到

是年冬,孙诒让拿出《瑞安古甃记》旧稿整理,增广著录,著成《温州古甃记》。也是这年,温州府学教授戴咸弼编纂成《东瓯金石志》10卷,请孙诒让校补,孙诒让便将《温州古甃记》中所著的历代砖之研究成果全部补入该书,作为第一卷,又将温籍人所收藏的没有明确年代的金石古物汇为另一卷,作为该书的末卷,1883年完成校补,《东瓯金石志》由10卷增至12卷。古砖石刻研究只是孙诒让金石学研究的一小部分内容,他金石研究范围、研究成果远不止这些,还撰有《古籀拾遗》《古籀余论》《名原》等及大量金石考释、题跋留世,孙诒让的“晚清金石学大家”名号是实至名归的。

1916年底,孙诒让去世七八年后,中国近代著名学者、古文字学家王国维(1877—1927)在上海“蟬隐庐书店”偶然发现了《契文举例》手稿,以五元钱购得并荐举。1917年,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罗振玉(1866—1940)出资出版了一卷本《契文举例》,才让这部甲骨文字考释的开山之作得以面世。

孙诒让是我国甲骨文字学研究的开山鼻祖。王国维评价:“书契文字之学,自孙比部而罗参事而余”。“孙比部”指孙诒让,“罗参事”指罗振玉;郭沫若评价:“甲骨文字之学,创始于孙仲容,继之者为王观堂,饮水思源,二君殊可纪念。”1964年5月,郭沫若来到瑞安,并在玉海楼挥毫写下这段话。

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、断代者、收藏者和研究者,而孙诒让则是系统研究的第一人。两位金石学大家,因甲骨文在时空上有了交集,铸就了中国甲骨文学术史上的两座丰碑。



扫一扫,看电子版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